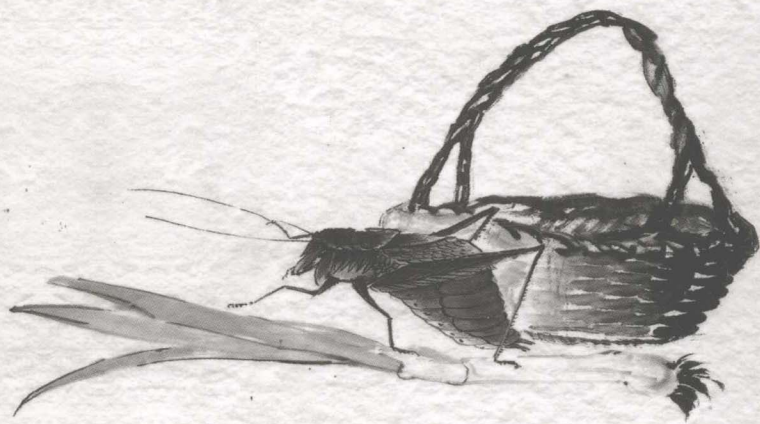


· 名人谈名家丛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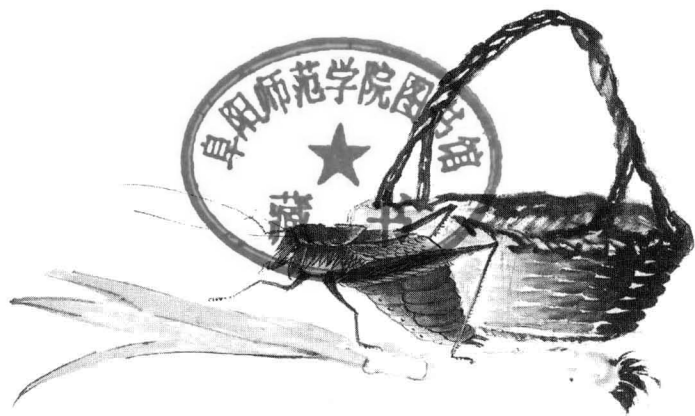


岁月如云

SUIYUE RUYUN 吴泰昌◎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名人谈名家丛书 ·



岁月如云

SUIYUE RUYUN 吴泰昌◎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如云/吴泰昌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名人谈名家丛书/徐城北, 吴宣文主编)

ISBN 978-7-227-01827-8

I. 岁… II. 吴…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2452 号

岁月如云

吴泰昌 著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1827-8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我算不上什么名人，但我或长或短地接触过、实实在在地接触过文化界一批名家，有前辈、同辈和晚辈。

本集所收的文章，都是写留存在我记忆中前辈们的。有些已经过世，有些还健在。

就我的感受，他们身上闪耀的东西，还值得我去再写。有些，我至今还不曾写过。只要自认为该写的人物，迟早我的笔会触及他们。

虽然我较长时间从事报刊采写编辑工作，我写过，但不喜欢写访问记一类的文字。我喜欢用散文的形式写人物。

我没有也不习惯写出我笔下人物的全部，我写的是我亲身经历和留下深深印记的一面，一点细节，或许对我们了解他们有所裨益。

文章排列顺序，没有什么考虑，这是应该说明的。

没有城北先生的创意，我是想不起编辑这本书的，没有王山先生的协助，是难以如期交稿的，谢谢他们。



吴泰昌

1997年11月

目 录

自 序	(1)
《女神》的一个修改本	(1)
《郁达夫诗词抄》晚出之谜	(5)
刻在心上的记忆	(8)
阿英的最后十年	(13)
《阿英文集》编后的话	(21)
关于《红楼梦戏曲集》	(24)
齐燕铭遗札	(33)
在香山没有红叶的日子里	(37)
海棠花开	(41)
飘浮在眼前的那片白云	(43)
随叶老漫游	(47)
海棠树下的约会	(52)
愿这个片刻长久	(56)
从郑振铎、叶圣陶从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谈起	(61)
最早评论《子夜》的文字	(64)



夏衍谈报告文学	(66)
一氓老的雅趣	(71)
听朱光潜先生闲谈	(81)
未了的心愿	(92)
《诗论》重版漫忆	(95)
寂寞吗？杨晦老师	(101)
老师的书	(104)
吴组缃的《山洪》	(108)
燕园的黄昏	(112)
憾 事	(117)
忘了时日的五天	(120)
忆念中的诗人小川	(122)
我的戒烟	(127)
难忘的微笑	(132)
想起“亭子间”	(136)
温暖的记忆	(139)
梦的记忆	(142)
她钟爱带刺的玫瑰花	(146)
相会在月季花丛中	(149)
险闯大祸	(150)
真 情	(155)
乐在浏览	(157)
飘动的红叶	(159)
“巴金这个人”	(161)
巴金获法国荣誉勋章记	(171)
巴老的“杂事”	(175)
妙愿难成	(177)

秋天里的钱钟书	(179)
默默地灌注着心血	(186)
三个和尚	(192)
孙犁是这样回答的	(195)
交往不该累	(204)
傲然开放的菊花	(206)
开卷有益	(210)
不该忽略的文坛老人	(212)
扉页上的话语	(215)
笔 健	(218)
紧含眼中的泪	(220)
失约的家宴	(228)

《女神》的一个修改本

抗战初期，郭沫若同志曾修改过《女神》中的个别篇章，准备出版。后来没有刊出。

那是一九三七年秋天。郭老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全面抗战的隆隆炮声使他匆匆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的伟大斗争。他领导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了《救亡日报》。他积极宣传文艺要为抗战服务，要求其内容和形式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顿时，《救亡日报》上宣传抗日的墙头小说、街头短剧、报告文学、速写、短诗百花争艳。郭老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也不闲笔。他写了一些有鼓动性的战斗诗篇（后来收入《战声》集中），写了《前线归来》、《在轰炸中来去》等报告文学。他同时探索如何使历史剧为现实斗争服务。当时沸腾的生活使他不能安下心来进行长篇巨制。他选取了《女神》中短小的诗剧《棠棣之花》作为尝试。

比较一下早先的《女神》，可以发现作者对《棠棣之花》的改动是不小的。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适当地顺理成章地强调了团结抗日的思想。二，暗中批评了蒋介石打内战的不得人心。

如聂政的一段台词，原文是：

战争不息，生命底泉水只好日就消殒。这几年来，今日合纵，明日连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争城者杀人盈城，争地





者杀人盈野，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的是甚么。近来虽有人高唱弭兵，高唱非战，然而唱者自唱，争者自争。不久之间，连唱的人也自行争执起来。

修改后是：

这几年来常常闹着内战，今日合纵，明日连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的是甚么。其实我们的敌人不在中国内部，是在中国外部的。我们中国人把外部的敌人丢掉，时常自相屠杀，将来怕只好同归于尽吧。



名人谈名家丛书

又如，剧末姊弟二人满腔热情的对话，原文是：

聂政：（起立）姐姐，你这么悲抑，使我烈火一样的雄心，好像化为了冰冷。姐姐我不愿去了呀！（挥泪）

聂荃：二弟呀，这不是你所说的话呀！我所以不免有些悲抑之处，不是不忍别离，只是自恨身非男子。……二弟，我也不悲抑了，你也别流泪罢！我们的眼泪切莫洒向此时，你明朝途中如遇着些灾民流黎，骷髅骯骨，请你替我多多洒祭些罢！我们贫民没有金钱粮食去救济同胞，有的只是生命和眼泪。……二弟，我不久留你了，你快努力前去！莫辜负你磊落心怀，莫辜负姐满腔勗望，莫辜负天下苍生，莫辜负严仲子知遇，你努力前去罢！我再唱曲歌儿来壮你的行色。

改后的文字是：

聂政：不，我倒想不走了。我没想出姐姐你竟这样的悲哀，

你使我这火一样的雄心都冷了一大半。

聂荃：对你不住。我的确是有点悲哀，但我悲哀的并不是怕和你别离，乃是恨我自己身非男子。我假如是男子，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也不悲哀了，悲哀终究是没有用处的。我虽然是女子，也有我们女子所应当做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有了我自己的计划。我要对着月亮，对着母亲的墓，向天盟誓，我要永远不辱没你，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我看，你现在可以去了。不要辜负了严仲子对你的知遇，不要辜负了天下的苍生。好，你去吧。我再随意唱几句来壮壮你的行色。

从上面两段引文可以看出，作者在语言上也力求改得更口语化，原来典雅的文字语言成分多一点，不易上口。作者为了让修改后的剧本便于朗诵乃至演出，特别留意语言的通俗。

郭老修改用的是上海泰东图书局一九三〇年七月出的第十版的本子。扉页上有作者用钢笔篆书写的“郭沫若章”四字，下边并列三次铃印了“郭沫若章”。可见这是作者的自用本。除用钢笔在书上修改外，改动多的地方还加贴了字条，作者在修改时，还随手改正了一些错字。

据阿英同志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郭老离沪去香港前，亲自将这个修改本留交给他，托他设法印出。因战局恶化，未能刊印。后来阿英同志去苏北找新四军，此事就这样搁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同郭老几次谈到这件事。郭老在修订《女神》和校订《沫若文集》时都希望能看到这个本子。但阿英同志离沪后存留的书籍几乎全部遗失了。庆幸的是，这本《女神》几经辗转，于一九六五年又回到了他的手中。这大概与扉页上盖有“阿英”一方小型私章有关。阿英很快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郭老。那几年因为忙，他们相





约闲暇时再细细地看。很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更没有机会来研究这本书了。一九七六年，阿英同志病重时，他在被江青、陈伯达劫余的个人藏书丛中，竟然发现了它，还完整，只不过书皮脱落了。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郭老精神还好。我向他汇报《女神》修改本找到了，并请教他有关修改的情况。他说，看了本子回想回想再谈。不久就得悉郭老身体不好，而且是日趋严重的坏消息。我们怕他见到这本书勾起过多的回忆，情绪受影响，因此不敢轻易惊动他，总在盼望着他身体早日康复。



名人谈名家丛书

郭老生前没有重新看一遍四十年前他的这个修改本，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虽然那次修改，郭老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创作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第一幕时，已大体采用。但是它对研究《棠棣之花》这个剧本，对研究《女神》，对研究郭老历史剧，对了解郭老抗战初期的思想却是很难得的材料。在郭老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这是很细末的一件事，但它有助于使人真切地感受“他的笔，始终与革命紧密相联；他的心，和人民息息相通”这句话的分量。

1978年6月



《郁达夫诗词抄》晚出之谜

郁达夫是现代名小说家，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旧体诗词。作家本人甚至觉得自己的诗词比自己的新小说更好。郭沫若说：“他的旧诗词却颇耐人寻味，真可谓名实相副，‘郁郁乎文哉’了。”

一九八一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诗词抄》刚一投放书市，人们就叫嚷得之不易。达夫一生写了大量的诗词，散佚不少，难以搜齐。六十年代初海外出版过陆丹林编的达夫诗词集，比这本单薄多了，且有多处讹误。这样看来，《诗词抄》引起人们的重视、喜爱就很自然了。我曾亲自听到文艺界两位老前辈对该书异口同声地称赞，一位小说家说：“现代作家中，达夫的旧诗词写得好，还有田汉。”另一位美学家说：“旧诗词写得够味的是达夫，田汉的也不错。”这么好的书，初版印了一万二千册，怎么能满足广泛的需求呢？去年四月初，我从杭州冒雨去富阳，原想在达夫家乡代友人购买几本，书店说进货不多，几天就卖光了，很使人失望。

有些读者，读书读得真仔细，有一位问道：郭老《郁达夫诗词抄》序文写于一九五九年，离“史无前例”还有六七年，书何故迟迟未能出版？香港《新晚报·星海》副刊上，有篇评介文章，也正正经经地将这个问题，当作一个谜提了出来。

编者周艾文、于听在《编后记》中谈到搜集、编订这本书“历经三十年”，至于为何未得付梓，不曾交待清楚。



一九五九年，这本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原拟出版。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间，编者将原稿加以增订，并送请郭老审阅。郭老据此将写成的序文作了些修改，一九六二年八月四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郭老事忙，将稿子转给了阿英、孟超，希望他俩帮助阅看。阿英、孟超都是达夫的老友，一九二八年，在太阳社时期，他们曾征得达夫同意编选过一本《达夫代表作》。一九六二年，阿英在中国文联，孟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郭老将此事转托给他们两位，也是放心的。岂知稿子转到阿英、孟超手里，一年左右没有下文，编者之一周艾文着急，数次催问。另一位编者于听（即达夫长子天民）一九六三年八月写信给郭老，问及此事。郭老将原信转给阿英，建议直接回他一信。接着，文艺界整风开始，继之十年动乱。“四人帮”垮台后，编者又过问起这件事。

郁天民从富阳来京，看望了郭老，并向重病之中的阿英打听这部稿子的下落。当时阿英劫后剩余凌乱地堆放着，查找几遍未见。幸亏编者手头还保存了一份复本，《诗词抄》的出版才有可能。

一九七七年四月初，阿英最后一次住院前一天晚上，他精神尚好，和老伴林莉闲谈往事。近些天，他偶尔翻看他在新四军时期写的《敌后日记》，有时叫我念一段，他对日记中某些记载不详的部分，作些解释、补充。因下午达夫的侄女郁风、侄女婿黄苗子来，话锋转到达夫诗词的事，我问他，郭老转来的那部稿子为什么在这里搁置许久，是忙，身体不好，还是有别的原因？阿英说，忙也忙，那时我正在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但这不是主要的，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原稿比这字数多，我也很快看了。《郁达夫诗词抄》原稿我也看了，不止一遍，当时对是否就这样出版拿不准。他说，达夫诗词写得虽好，但其中有不少应酬之作，被赠者的政治情况相当复杂，有些弄不清楚，有的明显不好，六三年前文艺界的气氛不太适宜这样出书。阿英想，要么精选一下，要么



晚出，但又不便将这些考虑写信明白告诉编者。于是就拖下来了。他曾同孟超商量过，孟超同意这一考虑。郭老转来郁天民信后，他又当面与郭老谈过。谁知事态如此发展，一拖就十几年。阿英说，他在原稿上作过一些校记，对其中个别是否系达夫之作，亦表示怀疑。阿英说，专案组为此事查问过他，他估计稿子是被当作罪证拿走失落了。

《郁达夫诗词抄》问世时，阿英、孟超均已遭“四人帮”迫害致死。他们当年为出版郁达夫这样有成就作家的诗词集，思虑过多，不得已采取了这种拖延的态度。对编者的急切心情，无疑是泼了一瓢冷水。特别是当阿英后来得知，周艾文在“文革”期间因此受罪吃苦，阿英更有一种歉意，希望以后有机会向他解释一下。

还是细心的读者会想问题，他们说，达夫诗词抄如果早出了几年，说不定十年浩劫中作家本人连同编者、出版者因此会吃更大的苦头呢！

1982年9月



名人谈名家丛书



刻在心上的记忆



名人谈名家丛书



茅盾来到全国短篇小说创作会上（一九七八年）

多雨的江南之春。在上海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听到了茅公长逝的噩耗。那是在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的家里，时间是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二十五分，电话铃突然响了，主人的女儿习惯地拿起电话，当她脸色大变，失声喊出“茅公”时，一切都毋须说明了。主人披着上衣急忙地走去接电话，只见他十分艰难地、一句一顿地说：“很吃惊，很难过，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浓重的四川乡音传出的是难以言说的深挚悲痛的感情。

我又想起一个多月前，在我江南之行的前夕，我去北大看望一位病中的老师，闲谈起茅公近年发表的文学回忆录，这位年已



七十的老教授感激地说：“三十年代我的两个短篇集子刚出版，茅公就写文章评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给予我很大鼓励。几十年来，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

这两位长者，在文学领域中都有卓著的成绩，有的称得上是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他们都忘怀不了当年茅公所曾给予他们的扶持。人们不难想象，在茅公活动于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漫长六十年中，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他都给予了多少滋润生机的雨露。

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偶有机会，向茅公求教。虽然他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身体不好，尤其是冬天，说话就气喘得厉害。但每次对于我们这些后辈的请求，有时甚至是过分的请求，都尽可能给以满足。前两年在他前院小会客室里，后来在他后院书房里，他总是静静地听我们谈，然后慢慢地解说，微笑里透露出慈爱与激励，在这种亲切平易之中又满涵着一位真正的长者严格的要求。

一九七七年秋末，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被迫停顿了十几年后作家们第一次自由探讨创作问题的会议。大家高兴地听了茅公的讲话。讲话稿整理出来后，题名《老兵的希望》，《光明日报》要先发，茅公招呼校样他还想看看。送去后他当即看了，只改动了几处。临走时，他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开玩笑地说：讲话稿不如写文章文字那样推敲，整理时可以去掉一些可有可无的虚词，尽量精练些，这项工作你们编辑应该做。晚上，我仔细琢磨他的改动，很有收益，夜凉了，还感到他的手留下的余温。

第四次文代会的开幕词是茅公作的。他因身体原因，要大会筹备组先代他草拟一份稿子。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冯牧同志和张僖同志叫梦溪同志和我去茅公家，听取他对开幕词草稿的



意见。下午三时半按约见到他。那天他精神尚好，翻了几页铅印稿，说四千字长了，有一千多字就可以了。他说有些问题在别的报告里要讲到，创作问题他又另有一个发言。因此茅公说他要亲自动笔，叫我们将稿子留下，明天上午十一时后再去取。次日十时半我们提前去时，他已将稿子改定。可见他是忙了一夜。他翻着删改后的稿子给我们看，一一说明为什么这段要删，那几句要加。他的这种严肃认真精神使我们感动不已。他还说：写这类文章要干净、简短，重点突出，切忌面面俱到，同时要有个性，表达方式和语气要力求符合讲话人的习惯。



茅公的谈话，哪怕是三言两语的插话，也很富有思想和启发。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日下午，我有事去茅公家，顺便请教他关于柳亚子诗词的评价问题。一九七八年夏天，我业余读了一点柳亚子诗词，为《中国现代文艺研究丛刊》写了一篇浅显的文章：《谈柳亚子的诗》，自己深感我们过去对柳诗的研究不够，但究竟应该怎样适度地评价拿不准。我很想听听茅公的高见，接受他的指点。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反问我的看法。茅公说：柳亚子的旧体诗词成就很高，史料价值也大，现在对他的评价不够，他说有机会他要谈谈这个问题。不久他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副其实的。”茅公从文学史实际出发引出的这个新鲜见解，为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所赞同。茅公在学术上的这种勇气，直到他搁笔之前写的一些短文中还充沛地葆有。去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我随罗荪同志去茅公家，请他为即将改刊的《文艺报》写稿。据茅公的亲属说，他正全力以赴埋头